

第一辑

忆旧怀远

杨刚与百姓同在

为了给长辈扫墓，到北京西郊八宝山人民公墓去。这是京城老百姓的墓地。这几年，公墓也在开拓创新：山顶盖起了办公楼，零乱的墓穴作了整理，修筑了通向各墓区的通道……

就在崭新的办公楼一侧的路边，我忽然发现一块高约 4 尺的墓碑，上面刻着“杨刚同志之墓”。墓旁围了一圈瘦小的柏树。看来这座墓原是淹没在拥挤的墓群之间，随着通道的开辟，就显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了。墓紧挨着路边，不留余地，墓碑更显得引人注目。

看到墓碑，我不禁惊讶：杨刚的墓怎么会在这里？凭我的想像，以她的党龄，她曾经担任的职务，她的贡献，当然，她的墓应该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共和国奠基人的陵园里面。（注）

1946年，我进上海《大公报》馆工作时，杨刚是报馆的驻美特派员，虽闻大名而从未得见，只是读到她从美国发回的一篇篇通讯。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，周恩来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随军南下，到上海主持解放后的《大公报》，这才见到了她。她一点没有在美国居留过的那种女性的味道，一身灰布列宁装，伏案工作时不停吸着烟卷，言谈举止比男子更有男子气。她的豪爽正直，言论精辟，待人诚挚，很快在原来并不认识的同事中博得好评。不久，上海《大公报》发表《新生宣言》，宣告《大公报》属于人民。杨刚完成

任务后即回北方工作。后来听说她在外交部当了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；抗美援朝开始后，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，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开城谈判的工作；后又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、《人民日报》社负责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，并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。正在为她庆幸时，不幸的消息接连传来：1955年秋，她在参加一次外事活动中遭遇车祸，造成严重脑震荡，留下头痛难忍的后遗症。1957年秋，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，而当时正在反右的政治风暴中，这使她紧张万分，终于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一眠不起，终年51岁。从此就听不到有关她的音讯了。

27年之后，1984年萧乾选编的《杨刚文集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使怀念杨刚的亲友、同志感到莫大宽慰。读了杨刚的作品和附录的纪念文章及年谱，才知道了更多有关她的情况。她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，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。在校期间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，备受酷刑，坚贞不屈，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文化工作。她不仅当过《大公报》记者、文艺副刊主编，还是早在30年代就开始发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的作家，又是北方“左联”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。胡乔木为《杨刚文集》写的序言对杨刚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，认为单是她的散文集《沸腾的梦》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。她还是世界文学名著《傲慢与偏见》（英国作家简·奥斯汀的长篇小说）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，并兼任过岭南大学教授，讲授过“翻译研究”。抗日战争时期她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，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，还为党做过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。她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，“有男人而不能做男人的妻子，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”。丈夫分手后牺牲于日机轰炸，

幼小的独生女儿送往延安，自己长期过着没有家庭的生活。建国以后，她仍然独身一人，忘我工作，不分昼夜。周恩来非常器重她，曾对毛泽东说杨刚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。

这部《杨刚文集》出版时扉页影印着邓颖超 1983 年 9 月的题词：“《杨刚文集》出版 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 —— 杨刚同志的最好的纪念。”

现在我看到，邓颖超的题词竟被刻在杨刚墓碑的上端，像是一个文件的批示。我不知道原来安葬时有什么样的墓碑，而这块墓碑是 1987 年 1 月重立的 离杨刚逝世已达 30 年之久。

凡是上了一点年纪、经历过过去年代的人都会理解：为什么逝世后该进革命干部陵园而没有进去；为什么安葬时未能及时立一块恰如其分的墓碑，而在重立碑石时还要刻上领导人的题词。据说 杨刚生前“没有受过任何责怪”当然更谈不到受什么处分了 仅仅由于她逝世的特殊情况，本来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都成为不可能了 甚至连称呼一声“同志”也成为问题了。显然 有了邓颖超题词的评语，杨刚的一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，这不仅足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，而且就有理由大书“杨刚同志之墓”。在不算短暂的 30 年间，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不受处分而有处分待遇、不称平反而得平反之实的过程。但尽管如此，这位忠诚的革命家还是被摒于革命公墓的陵园之外。

正如墓碑碑阴镌刻的杨刚的两位外孙署名的铭文：“姥姥永远和人民在一起”，杨刚一生热爱人民，无私奉献，她安息于人民公墓，身处平民百姓之间，也许更符合她的夙愿罢！

（原载 1999 年 1 月 26 日《大公园》）

注：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八宝山南麓，除殡仪礼堂外，设有革命干部陵园，骨灰堂；人民公墓在八宝山北坡，除办公楼外，是一片墓地。

香港《大公报》忆旧

此番在港，居留时间超过以往十几年间的每一次，也就多了一些时间遐想 感岁月之易逝 念旧友之凋零 为此文以记 51 年前初到香港的往事。

那是 1948 年 10 月 我在上海《大公报》做记者 香港《大公报》已经复刊数月之后 忽一日 费公彝民 时任香港《大公报》经理兼上海《大公报》副经理 经常往来沪港间 对我说：“你已经列名黑名单 赶快想法走。”费公并告 他是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那里知道的，消息确实。这自然引起我考虑。早在 1947 年 7 月，上海‘文萃’案发 我的朋友 后称为‘文萃三烈士’者陈子涛、骆何民、吴承德被捕 我也因此而被中统局逮捕 拘留一夜 经《大公报》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电话上海市长吴国桢力救得出。在上海，我有再被捕的可能。其时 我在上海的朋友黎澍、孟秋江、唐海等 还有我的胞弟唐君放都已到了香港，那时候，我们把香港看作自由的地方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左派人士在内地有了政治危险，一到香港就海阔任鱼跃了。

《大公报》素有一个传统 对于同人之被捕者总是尽力营救 前举王芸生先生之力救我，只是一例。当王先生打电话给吴国桢时，吴说：“我刚从南京回来 明天再说吧。”事实确是这样 吴国桢赴南

京公干 当晚回来 我和《新闻报》记者严洵、张孝权（现易名文达）商报记者夏治淦三人相约夜访吴国桢，而我未及出发就为中统特务“请”走了。王先生毅然告吴国桢曰：“今晚不放人 我明天就登报。”这句话起了作用 我在亚尔培路二号中统上海办事处（今名陝西北路。这幢房子拆除了。真不该拆，多少人在这里被关押过，是历史的纪念。）被问了一番话之后，由一个特务用车送我到了吴国桢公馆。甫下车，严、张、夏三位正在扣门，我和他们是如约汇合了。1947年重庆《大公报》有记者曾敏之等多人被捕 尽管胡政之先生曾表示“爱莫能助”遭同人不满 王芸生先生则以个人名义表示对捕人的抗议。及后，《大公报》驻广州记者陈凡被捕 胡政之先生营救不遗余力 亦足以补前失。《大公报》此种做法 颇有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遗风余韵，蔡元培主张学生的天职是读书，不赞成罢课、示威游行之类，而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被捕了，他必竭尽全力救援，不达目的不止。

我向王芸生先生提出去香港《大公报》工作，顺利快速地达到目的。代买飞机票的同事设想周到，说是如飞香港，可能引起怀疑而追查 不如飞广州稳妥。于是 我在 1948年 10月的一天，由上海飞抵广州。抵广州机场，当时尚未谋面的《大公报》广州办事处记者黄克夫 径入机场 在飞机下客之时 冒叫一声我的名字 见面了。住广州一夜，翌日傍晚，再飞香港。几位朋友和我弟弟在启德机场接我 踏上香港土地，一颗心落地 不会有什么中统、军统来找麻烦了。

香港《大公报》在中环利源东街，是租用《新生晚报》的房子。无所谓编辑部和经理部，就那么一间楼上临街房子，白天是编辑部的日班人员和经理部办公，夜间则编辑、译电、校对、资料人员换

防，有时还要加上夜晚归来写稿的记者，室内无转身之地，一张桌子几个人用，没有一个人有独用的写字台，包括总编辑和经理。台上抽屉装的物件，也分不清是谁的。排字房、印刷厂在楼下，也是租用《新生晚报》的。这种窘迫之状 我倒并不吃惊。在入上海《大公报》之前，我曾经在成都一家报纸工作，那才算是最穷的报纸。其名为《华西晚报》 八开小报一张 如今国内即使是藏书藏报最齐备的图书馆，恐怕也不会找到这张报纸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张报纸可威风得很 革命性可强得惊人 共产党党报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不敢登的新闻，《华西晚报》敢登。《华西晚报》从总编辑到记者、校对，工资一律，它是最早实行平均主义的机构，可谓继太平天国之正统 工资数目 有同于无 大约只够买几包香烟。这真是“越穷越革命”。办公地方 起初借用一个学校 后来搬到一家赌场 在赌客喝五呼六声中干革命，旷古所未闻。有此经历，到了利源东街的《大公报》 我视之晏如也。起码工资有保障，一日三餐 供应饭食亦不恶 深夜编完报回去 的士送归。这在昔日《华西晚报》 均不可想像。《华西晚报》全报社人员 都是安步当车 除了一位记者有一部破烂的自行车。在香港《大公报》数月间 我和多数同人一样 感觉可以自由痛快地说话编报，不需再做违心的事了。工作条件虽差于分别来自上海、天津、重庆的《大公报》三馆 而工作环境完全变了。这段时期的香港《大公报》 便成虎虎然有生气。

到差之初 陈凡调往广州 任办事处主任 我接他的班 编本市版，这里称作港闻版。对于这个版面，我实在很乏味。充斥版面的新闻 无非是肛门藏金走私被查获 抢劫案等等 而其文字 粤语加似通非通的文言 令人难解。是以 我曾自嘲曰：“港闻版编得最好的一栏是‘今日广播’。”那时还没有电视 只有一个“丽的呼声”电

台“今日广播”四个字是做的电版 每晚送来节目表 换上就行了。谓之曰最好，盖言其他报道均无足看，也就是说港闻版整个地不足看。我这种观点，也许当时就与香港编报者和读者相异，时至今日 脱离新闻岗位已 30 余年 大陆编报渐趋港化 我已不适应阅读大陆报纸 更无论今日之港报了。今日之港报 与 50 年前相较 自然有了变化 变化所在 非我能言。

不久，陈凡复来香港，原编二版的曾敏之调广州补陈凡之缺，我接替敏之的工作。所谓二版，又叫次要闻版，意即次于第一版的国内要闻。这个界线很难划分，第一版和第二版常有扯皮，要之以第一版为中心，第一版稿子多了，它就向次要闻版甚至国际版冲；反之，它的稿子少了，就得向次要闻版甚至国际版拉。此拉锯之势几乎是每晚都有，因此，这三个版面总是最后差不多同时拼版看大样。要闻版编辑刘克林，国际版编辑谭文瑞，都是我的同学，我们 3 人都是一出学校就进了《大公报》 刘入重庆馆 谭入天津馆 我入上海馆，想不到如今在利源东街演稿件之拉锯战。然而，此中亦自有其乐。每当几近凌晨，稿子发齐，等待看大样，我们常买几瓶啤酒，佐以咸脆花生，当晚值班的编辑主任杨历樵（大家叫他杨老令公）或朱启平都参与我们的咸脆花生佐啤酒之乐，只有萧乾例外 他值班时，一面写他的专栏“时间的无慈”，一面猛喝牛奶。日前在“百佳”买得咸脆花生 大喜过望 满以为重嚼此物，一拾少年之乐 吃了一颗再也无从继续 这才忆起 耄耋老翁 假牙不胜此硬物，废然而止。而昔年同嚼此物诸公，杨老令公高龄仙逝，启平在美归道山，克林在“文革”方起时跳楼自杀，剩下我和文瑞南北间阻 几年难得见一面，真感岁月易逝，人生无常。

我初来香港，杨刚已从美国归来，由香港而上海，驻足王芸生

公馆 与芸老数议天下大势，《大公报》之去从。杨刚归港不久，芸老经台湾南来 相与偕者为《大公报》驻台湾特派员吕德润。不应该说是德润偕芸老来港。事实经过，恐台湾阻止芸老之行，因而是德润具名订购来港机票，声称《大公报》台湾分馆主任吕德润偕随员 1 人赴港，芸老真成了不具名的随员。德润近年时讲此旧事以为乐。以后，李公纯青从上海来 周太玄“ 法师 ”复以《大公报》多年客卿身份入香港馆为顾问 太玄“ 法师 ”引来杨东莼先生亦为顾问，上举诸公加上港馆复刊之初即为领导层的费彝民、李侠文、马廷栋诸公 诚然于当时决定了《大公报》的大政方针 使报纸变化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 不可忽略复刊香港后《大公报》的新闻取舍、言论和副刊文字，已经逐渐和内地三馆的报纸又不同了，其中尤以副刊“ 大公园 ”最为突出。所以 谈香港《大公报》 不能忘记全体同人明里暗里的实践，不能完全归功于领导的决定。且在时间顺序上，同人暗自的或者说是自发式的实践，尚早于领导的决定。自然，暗自的自发式的实践，只能起作用于局部，领导层的决定，则见效于全局。近年每见一些文章写杨刚对香港《大公报》的作用，作者于事实既多未明 不免偏而不全 且无论矣 其最突出的观点 把杨刚写成了女党代表，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作用。杨刚是我极为尊敬的前辈、同事与领导 此时在香港《大公报》 后来在上海《大公报》 她都做了重要的贡献，最突出的一点，凡事，她都和我们这些阅历尚少的年轻人商量，所谓走群众路线，大约就是这个意思。把她写成单枪匹马的女党代表，不合于事实。她如有知，也未必同意。至于以后天津《大公报》改名《进步日报》以及在《进步日报》版面上一系列批判《大公报》的激烈言论 显然是最高决策者的意志 不能归因和怪罪于杨刚。犹忆杨刚奉命先行北上，香港《大公报》同人自然

很关心天津《大公报》的命运。天津解放，某夜，新华社一条电讯，谓天津《大公报》改名《进步日报》出版 电讯中有《进步日报》领导人名单 除了宦乡、秋江 赫然有杨刚在。时夜班诸人都已上班 王芸老、李纯公也来了，或立或坐于临窗两横一竖的三张写字台前，瞠目结舌不能语。不久后，李纯公也奉命北上了，他也在天津参加了《进步日报》领导人的行列。时乎势也。但也许是事后反省，觉得初计未当，才换来了上海《大公报》于上海解放后原名原班人马照样出版的待遇。以后（1953年）上海《大公报》北迁天津 与天津《进步日报》合并 仍用《大公报》名义出版 诚然由于上海《大公报》处境困难，王芸老写信给毛泽东主席陈述，毛招王进京面谈，乃决计北迁 然两报之合并 恢复天津《大公报》之名 毛语王曰：“大公报王 恭喜你收复失地了。”可见 毛此时亦不以改名《进步日报》为恰当了。

尽管我们这些当时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工作的人 曾经为改名《进步日报》惊愕 过几天也就不以为意了 照样拼命努力办报纸 把一张报纸办得来革之又革。而在报社内部，由上而下，有学习会的组织 是为自觉改造思想的前奏。夏公 衍 首讲 谈的是改造立场问题。杨东莼先生继之 讲历史 谈时事 妙趣横生。太玄“法师”讲哲学，谈修养。大家干劲正大，期待中国的解放。但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也偶有令《大公报》人惊不能解的事。时在哈尔滨举行全国学生代表大会，我奉命写了一篇社评祝贺，过两天，杨东老又写了一篇同样题目的社评。东老引用鲁迅的话“血债必须用同物来偿还”偶尔笔误 把“同物”写成了“动物”。翌日，《华商报》大张挞伐 深文周纳 曲为解释 说是欠了人民的债不用血来偿还 企图用动物来偿还 是逃不过的 俨然是要清算《大公报》了。众人的惊

愕 远胜于改名《进步日报》以为是不准阿 Q 革命。继之 得知此文是潘汉年所写，更不能解。这事自然没有结果，杨东老只出以轻松的一笑 说是“我已经对小潘说了 他不知道是我写的”。此岂能以知道不知道是谁写的来作解释。这只是小小插曲一段。

我和《大公报》一些同事，还有馆外一大批朋友，都只是以香港为过渡，借得几个月的时间在此工作，等待回到大陆解放了的天地。5月27日 上海解放 整装待发；6月初，海运开通，我们即乘盛京轮返上海。同船多熟人，《大公报》之返上海者，计费公、王芸老夫人偕其小女芝瑜、刘克林、方蒙、魏绍文、潘际垌、袁水拍和我。这些人中，至今已死其半。芝瑜，当年的小姑娘，如今也是 60 开外了，在美经商，近年两晤，出语多父风，妙趣横生，且有丈夫气，人才也。

近年 大陆报刊对于昔年《大公报》(指 1949 年以前) 每多争论 攻之者以小骂大帮忙五字谏语为结 尊之者每反其言 辩曰对国民党政府，《大公报》何只小骂 且往往大骂焉。双方各各举出若干事例以为证。这样的辩论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将永无结论。窃以为，中国近代报纸的产生，其异于西方商业化报纸者，是文人论政这个特殊的格局。清末至民国，以文人论政为标目的报刊，频频兴起 而显著其成绩。梁启超之办《时务报》、《清议报》及后之《新民丛报》；章士钊、蔡元培、吴稚晖、章太炎等之办《苏报》 是其著者。甚而后来章太炎之主《民报》 虽为同盟会之机关刊物 要亦其章太炎、胡汉民、汪精卫等以文人而论政也。《大公报》自 1926 年以新记公司名义承办，即力主文人论政，以后取得了成功。1941 年美国颁授《大公报》密苏里奖章 张季鸾先生临危到会致辞 仍以《大公报》在商业社会中维持了文人论政而自豪自勉。文人论政就是

本知识分子之良知，本人民的立场，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。其所批评，也许有不准确，甚而不正确，要其所归不是一党一派之利益。从此立论，就无所谓小骂大骂，小帮大帮。文人论政的条件，离不了一支笔几把手，《大公报》的笔先是张季鸾先生 后是王芸生先生。文人论政为标的，又有巨笔如椽，所以成功。这些话，俱往矣，无非白头宫女说玄宗，原来是忆旧之文，并不以为今日的期望。

说到此，还有一点须为旧时《大公报》一辩。颇有文章论及香港《大公报》1948年至1949年之转变，谓曰起义。此实不可解。

《大公报》是一家民间报纸 没有一分官股 以它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之脱离国民党军政机构混为一体，岂能说得通。有人以王芸生先生在1949年前后发表的文章加以引申 说是这篇文章有云 他 王芸老 到解放区 是来向人民投降的 自称是投降 岂非起义。其时也，王芸老带着满腔热情，发此惊人之语，实是过分，并非不可理解，以后他再也没有用这样的语言。而且，王芸老谈的是他自己，和评价《大公报》亦有别。在《大公报》同人中 就我所知 只有萧乾一人 自称他 1949年在香港参加《大公报》起义工作 而且言之者再三再四。萧乾在1949年前后 遭文艺界部分人横施攻击 备受凌辱 唯其如此 便有违心夸张之语 既违事实 复反科学 对此也应这样看待。王芸老公子芝琛，近年根据档案材料，写了多篇有关《大公报》的文章 其中一篇即驳斥起义之说 是一篇理性分析的文章。文章发表以前 他寄给我 我改其题为“起义云乎哉！”今日谈此事 我还是五个字 起义云乎哉！

新纪将至 再越一年，2002年，乃是《大公报》创刊百年纪念。迄今为止，中国还没有一家报纸度其百年寿辰。亏得香港《大公报》的存在，使中国能有一家报纸将迈入百年之期。尽管不复再是

文人论政，究竟是可以记载一笔的大事。后浪推前浪，新人易旧人，逝者已矣，继起可追。为此香港《大公报》忆旧之文，其言不经，尚请旧新同人多所谅解。

1999年11月29日于香港城市大学

(原载 1999年12月15日《大公园》)

我和萧乾在《大公报》的日子

萧乾是在 1935 年 7 月参加《大公报》的直到 1939 年 在天津、上海、香港《大公报》都是编副刊。

我是 1934 年在北平兼任《大公报》驻北平记者。1935 年调到天津《大公报》后 专任平津版编辑兼外勤课主任。

萧乾主编的《文艺》内容多样化 辟了《读者与编者》、《文艺新闻》、《书评》等栏 很快引起读者的注意 来稿越来越多。萧乾写作能力强，干劲特别大。每天能看十万字来稿，下午还要给读者、作者写二三十封信，具体回答读者、作者的问题。编完稿后，又到排字房，根据领班拼版的需要 著写《答辞》。

我没有萧乾的本领。因为平津版新闻仍用旧标点，只占半个新式标点文字 如有改动 困难较多。我和工人协商后 就学习《文艺》版 改为新式标点了。

《摩登》和《文艺》

天津《大公报》的《文艺副刊》原由杨振声、沈从文兼任主编，创刊于 1933 年。

同年 由本市版编辑何心冷兼编《摩登》栏 主要内容为青年人解答择业、恋爱、婚姻、家庭等问题，很快引起广泛的重视，来函越

来越多。报馆领导人为维持本报信誉，解答问题更加慎重。因此，动员馆内很多同人参与这工作。为免影响全盘工作，只得宣布停刊。

后来从1935年9月1日起改出《大公报》副刊《文艺》由萧乾主编。当时也有许多青年人投稿。

萧乾谈编副刊的困难

萧乾在天津接编《大公报》副刊《文艺》以后曾谈到那时编副刊的困难：“除了明文规定的‘赤化’、‘反日满’的禁款外那时新闻检查，副刊免检，这省了事，可也加重了编者事后的责任。”

同时，还说：“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。我们的书评政策，一向是分析的、理智的。不捧谁，也不骂。而且，所有评沈先生和我自己的书的，都一概不登。”

1936年11月29日《文艺》出版的《散文特刊》集中发表何其芳、陆蠡、严文井、萧红、靳以等人的作品，这些人以后都成了名作家。

萧乾和名画家赵望云两次合作采访水灾地区

西北名画家赵望云，我早认识，他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农村写生，我很爱看。有次，山东遭大水灾，报馆特派萧乾和赵望云两人联合去采访，萧写灾情，反映民情，赵画灾民和灾区。两人合作得非常好，报上发表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同情，纷纷送来捐款，越收越多。后来，报馆又派两位赴苏北采访灾情，仍然互相配合得很好。当时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曾写诗多首赞扬过，这些诗都在报上发表了。